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如何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	丁 东
【往事非烟】	戚本禹这个名字与我的记忆	李大兴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 7 2 7 事件（二）	胡鹏池·但 燊
【一家之言】	从对联、老兵、联动说起	马小冈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如何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

· 丁 东 ·

〔原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 51 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的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 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嘉宾是中国著名学者丁东先生。丁东曾经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现在是独立学者。他对中国现当代的文史研究非常专业，也非常精深。编写了好几部关于文革的著作，比如这一本就是丁东先生两年前的著作。我知道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同的人与不同的时代说法都不一样，在这方面丁东先生有比较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就请丁东先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首先我想问丁东先生，最初的关于文化革命的评价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什么？

丁东：应该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发生就存在对文化革命不同评价的问题。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当时主流的评价就是毛泽东本人对文化革命的评价。他是文化革命的发动者。他基本的评价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从 5 16 通知，16 条，到九大、十大，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个评价。

徐：那后来或者文化革命中，有没有人对这个评价形成挑战，或者有不同的意见？

丁：这个评价可以说从1966年文化革命一发生，就遇到了挑战。但是挑战的声音，在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支流的、边缘的状态，是个别人分散的挑战，互相是没有呼应的。党内高层对文化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政治体制，高层人士不可能正面站出来否定文革，只能以旁敲侧击或者是迂回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看法。应当说，从1966年，到1967年，直到文革结束，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最后也意识到对文革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反对文革的声音，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公开的系统表达。

徐：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极其敏感、高度警惕的。有人间接的含蓄的表示对文革不是全心全意的拥护，毛实际上就是镇压。其实邓小平的第二次垮台跟这个好像都有关系，是不是？

丁：但是这件事我听到了和现在流行的说法不太一样说法。在邓小平主导中央否定了文革之后，有一种说法，毛泽东1975年让邓小平做一个关于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现在主流党史都这么说。实际情况可能跟这个有些差别。当时邓小平还是想找纪登奎起草，当然是按照毛的要求来起草。纪登奎说，九大以后我才到中央工作，九大以后的事情我了解。九大以前的事情我不了解。邓小平问，九大以前的事情谁了解。纪登奎说，张春桥了解。纪登奎知道邓小平和张春桥是什么关系。实际上纪登奎的回答，婉转地表示这件事做不成。所以邓小平拒绝毛泽东做肯定文革的决议的事实经过，恐怕还是今后历史研究的一个课题。

徐：但我记得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华国锋当政的时候，对文革的评价还在捍卫。直到后来华国锋下台，才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具体情况你了解吗？

丁：华国锋主导中央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到四年之间，说短了是两年，说长了也不到四年。现在可以看清楚两点，一，结束文革是华国锋。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说文革结束。虽然毛泽东说文化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有要收的意思，但是到死没结束。文革结束在华国锋的手上，华国锋宣布文化革命已经胜利结束。甭管胜利不胜利，是华国锋宣布的结束。二，华国锋从宣传口径上，还是坚持毛泽东的口径，但在实际做法上，并不是和毛泽东一以贯之，比如抓四人帮。

徐：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在实际行动上结束文化革命，或者有些说法和文化革命不一样，但是他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说文化革命好。

丁：他主导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五卷，还发表了署名文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应当说他当时的思想还是毛泽东的一套。但是他的做法上两点应当注意，一个给文化革命划句号，二是他的具体做法实际和文化革命不一致，包括对外开放。

徐：当时不说文化革命很好很有必要是件挺难的事情。后面这个弯转的比较大，中国的官方持的也是一个否定文革观点，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

丁：这个弯，我觉得首先是在中央层面上。政治权力发生了一次重新洗牌，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转到邓小平、陈云手里。转到邓小平、陈云之后，怎么评价文化革命就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对于邓小平、陈云来讲，对文化革命的评价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的转移问题。当时中央领导层有两类人。一类是文革中受冲击的人，边缘化的人，像陈云、邓

小平。还有一类是文革中地位提升的人，包括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汪东兴。权力转移了，就要解决对文化革命的重新评价问题。从肯定到否定，是为政治权力转移的背书。对于邓小平、陈云来讲，否定文化革命当时不是一个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所以，用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中央决议的方式，彻底否定文革，就给干部队伍重新洗牌确定了政治上的依据。否定了文革，那些在文革中权力得到提升、进入中央领导岗位的人靠边站，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进一步，各个层次的领导班子，都要进行重新洗牌，文革提上来的基本都要出局。

徐：实际上对文革的否定，跟权力格局变化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要请问丁东先生一个问题：从全面地彻底地肯定文革到后面的这种否定文革，后面这种提法是不是一直延续到党内外？是不是大家都一致地接受这么一个提法，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现在来说能不能定已于一尊，全盘的否定的提法，是不是就一直固定到现在呢？

丁：应当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革的定论到现在仍然是官方的主流定论，这个调子始终没有变。但实际上它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微妙的变化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从官方来看，大约在90年代中期，官方对于文革的做法，有了一个微妙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是强调否定文革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态问题，而且要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干部都要把否定文革当作政治任务。不但思想上要表态，而且组织上要清理、要换人，要按照这个标准来选接班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当时出了大量的有关文革的作品，有文学艺术作品，有新闻作品，也有一些史学的书籍。到90年代初以前，当时出版得不少。但是到具体人，有一个说法叫“宜粗不宜细”。具体做法包含几层意思。一层是怎么对待毛泽东，要把毛泽东的责任虚化，罪行尽量地按到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头上，具体的“恶”要尽量地体现在造反派、年轻人身上。在当时的话语中，老干部基本上是受迫害的形象，知识分子也是受迫害的形象。至于文化革命当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在不同阶段曾经拥护过文革、支持过文革、参与过整人，是要回避的。如果你这个人不是林彪、康生、江青集团的，后来被解放了，你这些事情就要遮蔽起来。再一层就是否定，在否定这个问题上不含糊，但是简化的否定。然而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上头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从简化变成了虚化，从否定变成了回避。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不管是出版物还是影视，还有课堂教学，关于文革的实际内容非常少，是能回避就回避，能不谈就不谈，但是在基调上还是要否定文革。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文革的调子没有变。

决议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现在，学界和一些重要的文革当事人也有反思。领导者是谁？提不提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既要保毛泽东的旗子，又要否定文革，在这两者之间要平衡，最终回避了毛泽东的名字。把一些毛泽东决策的事情，在主语上虚化，或者按在林彪、江青的头上。再有，被利用，有人也提出，毛泽东是什么人，他能不能被林彪利用？能不能被江青利用？说他被利用了，跟党内高层权力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所以虽然现在还是很强调坚持这个决议，某些表述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思考。

徐：那丁东先生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据我所知，现在群众中间越来越多蕴藏着这样一种情绪，对于文革的肯定，甚至怀念、呼唤的这种声音还是比较强的。既然中央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决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随着中共社会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强烈。请你把整个过程给我们解释一下？

丁：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次。本来在中国就存在官民矛盾。八十年代否定文革的时候，邓小平、陈云是党的正统，权力的正统。他们认为文革初造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对向政治秩序挑战的这些人，当时打击是非常严厉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官员阶层的权力膨胀。这个体制，权力不受制约，没有关在笼子里头。文革初期曾经向官员权力挑战过的人，

在否定文革的时候都吃到了苦果。官员以权谋私从80、90年代开始，就更加肆无忌惮。到了前几年，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大部分被权贵瓜分了，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想起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说法，以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就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

徐：那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更深入，更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呼唤正义跟平等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是不是应该用呼唤文革，用文革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

丁：我和一些文革参加者讨论过。他们这些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把巴黎公社看得很神圣。因为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过程中，巴黎公社也是作为一个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被推崇过的。

徐：我记得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决定16条其中专门有一条，就是以后的这种领导机构诞生的程序要按照巴黎公社，这对中国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现在有人回忆起来还津津乐道。看起来中国人是很向往这种公开公正选举领导人的形式。文化革命好像在一些群众组织里面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点。

丁：当时宣传巴黎公社精神有一条，说官员的待遇不能高于普通劳动者，而且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徐：还随时可以罢免）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它感召了很多参与文革的积极分子。有不少人当时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状态去参与文革的。虽然他们后来很快就品尝了苦果。但是他们现在面对中国社会非常不公的现实，就怀念起巴黎公社的精神资源。我跟一些造反派领袖人物进行过面对面的讨论。巴黎公社发生在1871年，到现在已经过了140多年，人类文明在这140多年间，走了很长的路，发生了很多变化。把权力关进笼子，制约官员的权力，不让腐败蔓延，达到社会公正，应该说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成功的探索。人类已经拥有了成功的经验。放着这些经验不学，觉得这是邪门歪道，非要去留恋巴黎公社的短暂的、不成功的尝试，起码是不理智的选择。

徐：照我看，把巴黎公社当成一个最高境界跟最现实目标，现在显然过时了。

丁：沿着巴黎公社的轨迹，后来发生了一些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波尔布特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岔道。权力更集中，更不受制约，还造成大量的血腥屠杀和灾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倒退。我们不能罔顾这些事实，还去留恋巴黎公社。

徐：但是丁东先生，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薄熙来出事之后，很多事情就说明，支持薄熙来的那部分中国老百姓，往往都是和支持文化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看从网上的声音来说，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表示怀念文革、呼唤文革的还是人数众多。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代表了民意呢？还是需要我们把道理说清楚？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需要批判性的思考的，你个人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丁：怎么看待重庆模式和它造成的影响，怎么看待这种怀念文革的民意，我们应当理性的分析。我们读了一些书，目睹了一些国家的不同制度安排，知道有比文革更好的路，应当认同更好的路。至于底层的百姓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发生对于文革的怀念，对于毛泽东的怀念，我抱着既同情理解，又想讨论说服的态度。当然，经过最近20年对文革采取虚化、回避的态度，文革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一般的公众，一般的青年，在主流媒体上，或者常规的课堂上，已经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对于文革“恶”的一面、血腥的一面、荒谬的一面，无从了解。这样，人们就可能怀着一种想象，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抽去当时的实际效果，

当作非常美好的东西来接受。如果关于文革的历史大家能够摊开来说，进行透彻的讨论，一般公众对于是非善恶还是有识别能力的。

徐：那看起来，对文革有所回避，不让研究，实际成为一个言论的禁区，是不可取的做法。（丁：太不可取了）可能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都是不可取的，对官方取得群众信任也是不可取的，看起来是这样吧？

丁：如果官方把建立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富强民主的国家不仅仅当作是口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目标的话，为了走向这个目标，也不应该对文革采取虚化、淡化、回避、封闭的态度。

徐：那丁东先生，我再问你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我们对文革有一些误解，有一些片面的错误的认识，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对文革的情况不了解，对文革附加了一些美妙的色彩。但还有一种更深的情况，就是很多对文革比较了解的，或者有所了解的人，他们对文革的看法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那就是除了涉及到对事实的掌握以外，还涉及到一个对文革评价的标准。我觉得你在这方面好像也有一些想法。实际上评价文革的标准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时代也是因人而异。这种变化的标准，你能总结一下有哪几种吗？

丁：文革发生50年了，评价文革有三种标准。一种标准是毛泽东的标准，一种标准是邓小平的标准，也就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标准，还有一种是以普世价值为标准。

徐：那你不能简练的总结毛泽东标准是什么，邓小平标准是什么，你现在比较看重的标准是什么？

丁：先说毛泽东的标准。因为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肯定文革就是必须的，否定文革就是大逆不道。再说邓小平的标准，他是否定文革。但是他是以自身的政治利益作为否定文革的标准。当时他否定了文革，对于研究文革来说，是打开了一扇门，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他是为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为出发点的。所以当时清算文革的罪责，板子是不是打得都客观都公正，也是留下了很多问题，有些人觉得，板子打到他头上不公正，所以在邓小平去世以后，就要出回忆录。像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觉得对他们的评价不公道。他们的回忆录，讲了大量的事实，也不无道理。还有一些事，是毛泽东决定的，文革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被供在纪念堂里，而响应毛泽东号召，参与做事的反而被判了刑，或者被当作“三种人”革出教门，最后境遇很不好。这些人也有不平之气。这些年，中国很多人思想解放了，既走出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对邓小平也不迷信。我们可以独立思考。可以拿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权、个人的尊严、公民的权利，拿这些标准来衡量文革当中的一切事情、一切案子、一切争论，这就出现了一批独立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不是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而是独立判断文革中的一切人、一切事。90年代以后，一些史学工作者以这种态度去研究文革。尽量还原文革的真相，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著作。这使文革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徐：照你看来，最后一种研究文革的态度跟评价的标准才是比较可取的。这点最后是否能够为大家所接受，你是不是很有信心？

丁：有信心。国门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人现在看见的事情也多了，不仅可以古今对比，而且可以中外对比。各种思想、各种学说都可以比较鉴别。评论文革当中的事，谁能摆事实讲道理，谁就有说服力。权力规定的结论和口径，强迫大家一定要接受，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徐：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有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在研究文革的时候，最后结论还是对文革持一个否定态度，但是遭到很多人的攻击。那种人就认为邓小平就是否定文革的人，因为邓小平在文革初期和刘少奇一样是镇压群众的，现在你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也是在否定文革。他们就把这种观点叫做是呼应官方的观点。实际应该不是这样的，你能把这两者说清楚吗？

丁：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主张以独立精神、自由态度，实事求是研究文革的这些人，在目前国内的环境下，话语是经常受到限制的，出书是很困难的，发表文章也不容易。从1996年文革30年到现在，有一些杂志在文革的整数年组织一些专题，结果不等杂志印出来，就受到打压，或者印出来，这个媒体就因此关门了。官方对独立研究文革是打压的态度，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宋彬彬道歉，《新京报》前脚报道了，后脚就受到了压力。所以，说主张以批判的立场来研究文革的这些人，就是和官方穿一条裤子，这种论断首先是不符合事实。

徐：但有个表面现象，就是都在否定文革。那些人好像持了一个立场，你不能纯粹是站在正面的否定文革立场，如果是的话，就是官方观点。其实这里面是有很深刻的差别，是不是？

丁：对于文革，不能简单地用肯定和否定来划线。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就太简单了。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文革说是一场运动，实际上里头套着许多场小运动。烙饼翻来翻去，有的人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是阶下囚。今天你是刀片，去整人，明天你就是肉片，在绞肉机上被绞。这种现象在文革当中太多了。所以，以简单的逻辑对待的历史并不可取。史学应该尽量以客观的态度，还原复杂的历史真相。对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些所谓造反派，也要做一些还原真相的工作。我对他们讲一讲自己的冤屈，抱着同情的态度。不能因此就说我是文革的支持者！史学研究就是应当尽量地恢复复杂历史的本来面目。

徐：文革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比如这次宋彬彬道歉，她强调自己是受害的一面，她的团队也强调她受害的一面。但持批评态度的人，就强调她是加害于人的这一面。好像每个人都有道理强调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这样的话对文革评价好像就是一锅粥，好像文革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事情。照你看，这是一个说得清还是说不清的事？

丁：如果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表达环境，讨论环境，你怎么说都行，你强调你受害的一面，受委屈的一面，也没关系。因为别人还可以说另一面。只要充分讨论，就会接近真相，就会走向理性。如果不让大家说，或者拿出一个结论强加给大家，结果，就是鸦雀无声，离真相真理越来越远。

徐：那最后，丁东先生，你能不能介绍你最近研究文革的主要成果在哪些方面？

丁：我最近20年一直是比较关注文革研究，也写了不少东西，但没有写出研究文革的专著。刚才徐友渔先生介绍的这本书叫《阅读文革》，这本书是我编的，里头大概有一半篇幅是我写的文章，另外一半是我编选的别人的文章。我是想通过这本书起一个导游的作用。把我认为最近这二十年出版的有关文革的通史、回忆录、专题研究，用书评的方式做一个大致的介绍。还选了一些综述性的文章，最后还有一个书目。就是想给关心文革研究的朋友提供一些方便。除此之外，我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叫《精神的流浪》。里头讲的不全是文革，其中部分章节是我个人在文革当中的经历。

□ 原载：公众号《影响力发现》

~~~~~  
【往事非烟】

戚本禹这个名字与我的记忆

• 李大兴 •

—

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好几个地方约我写文章，我都以那时我太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多少记忆为理由推掉了。前几天看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最后一个在世成员戚本禹也去世了，还有不少人在哀悼他，不禁忽然有一点感慨。

戚本禹是我最早记住的人名之一，原因很简单，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先父（李新）就被点名批判，点他名字的就是刚刚当上中央首长的戚本禹。那一年我五岁，记得很清楚的是6月28日第一次被抄家。来抄家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近代史研究所造反派，领头的是一位大高个，好像还算是父亲带的学生，原本是相当熟悉也对父母都很尊敬的。此刻因为父亲已被划入反动阵营，革命的大高个自然是横眉怒目，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家属于最早被抄家的一拨，抄家还不似后来那样完全失控；也许是因为抄家者主力是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员，虽然以革命的名义上房揭瓦，内心深处多少还有一点对师长的忌惮吧，家里被翻了个底掉，抄走了不少文件书籍，所有书柜都被打叉贴了大封条，但他们并没有砸烂什么物件。长兄钟爱的无线电器材也都被封了起来，每天只能透过打了叉的玻璃柜门干瞪眼看着。一直等到1968年2月戚本禹倒台被捕后，长兄才“自己解放自己”，把封条撕了。

那天父亲好像被扣在东厂胡同办学习班，我站在母亲身边，默默看着他们抄家。母亲打了一脸盆温水，连同脸盆架放在屋子中间，不卑不亢地对大高个说：你们辛苦了，完了事洗洗手。说完了就一言不发，带着我站在过道里。单元里大院里有多少人围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模模糊糊对自己的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有了意识。

很多年以后，遇见同一个大院的同龄人，似乎在他的父亲被批判以后院子里孩子们欺负他。我十分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哥哥罩着我，而且我因为营养不良，走路不利索，笨到别人都不太爱带我玩，也就没人欺负我。但是我很清楚自己是黑帮子女，是不受待见的。

和我熟悉亲密的人们，有时会惊讶，据说我是从小就读了不少书而且很文艺的那种人，却对童话缺少记忆也鲜有感觉。其实我在儿童时代也读过安徒生、格林童话，却是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1966年夏天在东四十条大街上看到被剃阴阳头的人慌张走过，记得曾经见过一个年轻女子，瘦腿裤的一边被剪开到膝盖上，露出白白的腿。

我第一次感到纯净的美，不是来自童话，而是要等到出国以后，在一个温暖的夏夜，寂静而狭小的学生公寓里，听莫扎特第20钢琴协奏曲。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开始想要拉开距离回首自己的童年。那时我已经知道，1966年夏天北京有很多死者，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有些胡同里的人名从此就消失了。

母亲告诉我，其实我们是相当幸运的。在抄家前没几天，家兄从住宿学校回来，说起外边开始抄资本家的家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先是把屋里挂的一幅齐白石画用一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语覆盖，然后在一个深夜把留了几十年的旗袍、高跟鞋、照片、信件付之一炬。我至今记得那深更半夜熊熊的火苗。火光熄灭的第二天，抄家的人就来了。

## 二

戚本禹18岁进入中央办公厅，后任信访科科长，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处理来访来信的秘书，官不大来头不小。1963年他写了那篇著名的《评李秀成自述》，投稿到《历史研究》。近代史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曾经在中央政研室担任历史组组长，颇谙中枢，又与毛泽东大秘书田家英是好朋友，遂送该文请田家英审核，在田家英表示同意后在第四期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中宣部为此开会，周扬批评《历史研究》，责成近代史所另一位副所长刘大年写文章反驳戚本禹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近代史所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都对戚本禹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周扬的讲话实际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态度，然而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个批示一出来，戚本禹就翻了身，继续写关于投降变节的文章，为文革中大抓叛徒留下了伏笔。他不久被提升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伊始就进入实际掌握党政权力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一度还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

学部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另一成员关锋直接指点和他关系很近的林聿时、吴传启发动的，时间在1966年5月著名的“516指示”刚刚发布一个星期之后，开风气之先。近代史所的第一场批斗会是六月初，由于所长范文澜被毛泽东点名指示要予以保护，被批斗的是刘大年、黎澍、李新和张崇山。先父李新1962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也是在座谈会上批判《评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学家之一，因此被戚本禹点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据父亲回忆，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戚本禹。1966年初，父亲有时候在范文澜家留宿，究竟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范文澜身体不好，原因已不可知。有一天戚本禹来访，父亲急忙躲避但是被戚本禹看见了，很不高兴，当即表示李新不尊重他。

比父亲罪名更严重的是黎澍，他被指控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戚本禹。据黎澍后来写的关于戚本禹的材料，他确实在1966年5月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后对刘大年评论说戚本禹“会很快上升，不过摔下来也会是很快的”。黎澍又写道：“可是我对一个人讲了，也就等于对许多人讲了”。显然他的话从刘大年那里传了出来，有可能是被揭发的。在那个严酷的高压年代，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乃至亲人之间的告密揭发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我还完全不明白发生的事情，只是记住了一些场景。然而批斗会、抄家之后的扣工资，直接影响到每日的生活。由于母亲在50年代末就退休不再有收入，家里的生计完全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父亲的工资被减过半。我记忆深刻的是那年冬天连着吃了几乎两个月的羊油熬白菜，大约是因为羊油比较便宜吧？羊油稍微凉一点就化作一颗颗细小的白粒，入口一种怪怪的涩感。我从小就像是饿死来投生的，五岁多就能吃一只大白碗饭菜。母亲出身大家小姐，平生不肯求人，但那时看到四个男孩子吃不饱，终于从某一天起开始四处举债。五年多以后当扣发的工资补回来，还掉欠的钱以后，竟然所剩无几。借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欠钱更是一种深深的负担与阴影。



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就先后进了监狱。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成立了学部红卫兵联队、学部红卫兵总队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三派。总队率先垮台，联队由于与王、关、戚三个人紧密关联，随着他们的倒台全军覆没，负责人悉数被捕。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在军宣队、工宣队入驻后也烟消云散。然后是“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是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都被狠狠整治，到头来几乎一大半人都有被关起来的经历。一个小小的近代史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不时传来死亡的消息。有被折腾病死的，更多是非正常死亡。如今最著名的，就是以叛国罪名义被处决的沈元。沈元学长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第一名的成绩入北大历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写出郭沫若自认写不出来的《〈急就篇〉研究》。1963年黎澍调他到近代史所，对他很爱护。到文革中黎澍被批斗，沈元也被揪出陪斗。他和一位美丽并有思想，在当时就敢于说出戴高帽、挂牌子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做法的表妹结婚，却被扫地出门，连栖身之地都没有，最后铤而走险，涂黑色鞋油冒充黑人闯入马里驻中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被立马交还。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被枪毙，年仅32岁。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听说了沈元一案。应该是听黎澍讲的，那是他一生中很痛心的意见事情。不过谁也不敢质疑“叛国罪”这样巨大的罪名，仅仅能私下里表示一点惋惜。学部在七十年代还曾经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被枪毙，是因为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在那个年代，沈元会被和一个杀人犯一道提起。据记载，沈元的母亲非常坚强，直到1980年收到了一纸平反书，才大放悲声，说她要的是活人，不是一张纸。

### 三

世纪末的一个聚会上，遇见一位微胖和蔼的中年女性，一说话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友琴学姐，她当时就已经致力于收集文革个案史料，写出的文章让人触目惊心。那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谈论苦难历史的场合，晴朗的天空和美食更适合现在进行时的社交。酒足饭饱以后回到家，打开电脑去她的网站，读她收集的一个一个受难者的记录，感觉不知道是此刻温暖的夜晚还是那些残酷的场景更接近人生的真实。

王友琴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她是最早详细报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卞仲耘1966年8月5日被学生打死的学者。我以前就提到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是父亲的同事，他在文革中大约是1969年，曾经到我家叙述这一惨剧，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中年男人痛哭流涕。

这些遥远的记忆我并不会经常想起，但我知道它们一直在那里。离开象牙塔之后，我不再有条件研究历史，兴趣也飘移向别处，但每一看到有关学部的文革回忆或者是有关文革里死去的普通人的记录，我会一字不漏地阅读。经过多年的史学训练，我明白追溯历史是为了叙述真相，而不是做出判断，并且需努力超越个人经历与感情的影响，这一点尤其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我读王友琴的文章，时常有深深的刺痛感。她记录的死者大多是普通人，教师、市民、出身不好的人，而且很多是女性。他们或者原本就已经是“地富反坏右”的种姓，被打入社会另册，或者由于种种前定乃至偶然的原因，被革命大潮的铁拳粉碎。我也见过或者听说过不少家的老人，原本出身富裕，晚年投奔子女，文革中却被打成地主、地主婆等驱逐回原籍，在贫困病痛中死去。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大多数人都卷入的大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仿佛30年代德国治下的犹太人，只有受害的份儿。近年有时会看到一种说法，那些半个世纪前相当活跃的加害者，本人往往也是受害者。这种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的说法，看似公允练达，实则逻辑可疑。把几乎所有人都说成受害者的背后，是责任的开脱。

八十五岁病床上的戚本禹，看上去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任何一个人的去世总是令人哀悼的。据说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据说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许多人期待的反思与忏悔，这也在意料之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遗忘似乎比追寻历史的足迹走得更快。近日发表的一些文章，或者把他描写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者用看上去中立的语言叙述他的生平，避而不谈他在历史上发挥的功用。古人云生死亦大矣，然而毕竟不应该因此就把一个鹰犬也说成是受难者，死在2016年的人和死在1966年夏天的人是无法等同的。

~~~~~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727事件（二）

• 胡鹏池 • 但 桑 •

◇ 蒯大富召开总部会，杨余傅黑后台指向谁？

一、蒯大富召开临时总部会

刘才堂前脚溜进明斋，蒯大富后脚回到静斋。在727整整一个大白天，蒯与刘居然就没有机会再见面。

中午12点多，蒯大富一行回到清华西门。西校门内外全是工宣队，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蒯等只好弃车、绕道从西南门附近进了学校。

当年的西南门其实只是一个小便门，如同房门一般窄小。当天西南门里外全是人，没有发生踩踏就不错了。鲍长康回忆是从西南门附近爬墙回的清华，蒯大富回忆是从工人队伍旁边走进了清华。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会认为两者有矛盾，其实当年的西南门附近的围墙确实是有个缺口的，“走进来”与“爬墙进来”的区别并不大。本书两作者当年都曾许多次走过西南门，因为从那里斜穿马路，再由农田小路到北大最近了。

在蒯书中，韩爱晶写到这一段时感叹道：很多工人坐在地上，把静斋也围起来了，但控制不严。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和司机回到团派总部所在地静斋，蒯大富还登上屋顶观看，看到市革委会常委、市工代会的鲁文阁和徐凯在下面。这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蒯大富还不醒悟，也不打听打听，根本无视这些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朋友，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蒯大富还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

鲁文阁是北京市第二机床厂（笔者记得这个厂位于宣武门附近，主要产品是“牛头刨”）的造反派头头，徐凯是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二七红色造反团”头头，他们也率本厂的工人队伍参加了“工宣队”，参与了围楼，但此时还没有开始攻楼。同时他们都是蒯的造反派朋友，于情于理，他们都会劝说蒯大富停止武斗，放下武器。

韩爱晶痛心疾首地说：蒯大富“简直盲动到了发昏的程度！”。我们理解韩的这段话表明了蒯再一次面临了“停止抵抗”的机会，然而他再一次放弃了这个机会。

人有时是会“盲动”的，有时也会“发昏”，但那往往是“一阵儿”。蒯在7 2 7的全天行为能否用“盲动到发昏”来界定，我们是不相信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与一些清华文革研究者的主要分歧也盖源于此。我们认为蒯7 2 7的行为是他极端极左思想的惯性延续及淋漓尽致的大暴露，而决不是他头脑发昏时的“梦游”。

据清华校史记载：“蒯大富1 2时后回校在静斋召集团派总部头头开会，指责（工宣队的）这一行动是‘杨余傅和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4 1 4）压老团的’。会议决定：1.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坚守已有据点，不让工人进楼，如果工人硬攻，就抵抗还击。团派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方式将第二条决定向武斗据点下达。”

校史用极为简洁、极为准确的文字揭示了蒯大富对“工宣队进校”所采取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就是“抵抗还击”这四个字，这才是造成“死亡5人，受伤7 3 1人的血案”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也无法否认的。

这次会议可能没有原始记录，有关的回忆也很少，需要详细探讨。

1、会议时间：中午1点左右。

蒯1 2点多回到静斋，加上在楼顶“观山景”，下来后打电话的时间，将会议开始时间确定为中午1点左右，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

2、与会人员：蒯大富、任传仲、陈育延、段永基等十余人。

与会者中没有刘才堂，此时他在明斋；也没有崔兆喜，他上午去了北大，此时虽然已经回来了，也许正行进在回明斋的路上；散布在各据点的总部委员参加的也不多，因为他们不能轻易地走出被包围的据点，也不能轻易的进得了静斋总部。

以上情况大致都不出所料，但有一个新情况却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也是推理所推不出来的。

我们原以为刚刚与蒯大富一起从市里回来的鲍长康一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参加者，然而新近在微信群中鲍长康却断然否定他参加过这次会。鲍并且说有陈育延的记录为证。

如果鲍说谎，我们找不出他说谎的动机与理由，所以应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那么接下来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个问题：鲍长康放下如此重要的会议不参加，他到哪里了呢？他又去干啥子要紧事呀？

这是一个悬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询。

3、定调子：

这里所说的“定调子”，就是给工宣队定性，确定工宣队是敌还是友？确定团派与工宣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果在这次会上将工宣队确定为：“杨余傅的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压老团的”，这就确定了确定了工宣队与老四是一伙的，团派与工宣队是“敌我矛盾”，

4、无论是谁定的调子，蒯大富都是第一责任人。

这个调子究竟是谁定的？有没有经过分析与讨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无论是谁最早提出来的，无论是谁定的调子，蒯大富在会上都是同意的或者默认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蒯大富是团派的“法人代表”，是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人。

从蒯屋顶喊话及此后的讲话，及会上通过“两点决定”的理由，即使直接说成是“蒯大富定的调子”，也是理由充分，完全可以成立的。

5、 两条决定：

第一条决定：紧急请示中央。这是蒯大富与极少数人的事。

第二条决定：抵抗还击。这是各方要办的事，需要下达与落实。

6、 下达方式：

校史记载：“‘决定’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形式将第二条向团派各武斗据点下达”。

其实有多种形式，如专人负责、派具体人去作具体通知。唐少杰书中说：“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有一份材料记载具体负责通知的是总部委员陈育延。本书作者对此不置可否。时过境迁，这个问题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决定”是存在的，而且下达了。

7、隐瞒了上午的吴蒯会，也隐瞒了吴德通知。

对于蒯大富在上午10点左右在北京市革委时，吴德受谢富治委托向他传达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以及蒯大富本人在市革委会所作出的承诺之事，会上只字未提。除了吴德的书外，也从未见载于其它任何资料。

8、另有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可以进行合理推测：

除了会上两点决定外，蒯大富在会前会后有没有私相授受的“密令”呀？有没有私下里对个别亲信或重要人物进行“路线交底”、“任务交底”呀？

尤其是鲍长康居然没有参加会，是不是蒯大富对他另有指示呀？是不是另要他去办什么要紧事呢？

又尤其当蒯大富下午2点半钟离开清华时，他有没有什么临行前的“悄悄话”要对战友说？按常理是可能有的，所以可以推测，并用后来发生的事实进行分析与证明。

二、广播基调变化的过程

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明斋广播台如何将工宣队定性为“受杨余富黑后台操纵的”？似乎是胡里胡涂、鬼差神使般出了笼。

我们只能排列一下广播基调的变化过程：

1、工宣队刚进校时，工宣队“继续麻痹一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团广播台按照惯性思维以为这天来的工宣队与前几天一样，无非是在校园内外挥挥小红书、舞舞小彩旗、喊喊口号，唱唱语录歌或“临行喝妈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之类的样板戏，然后就会“忽然一声哨声响”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广播台的宣传口号与前几天一样，仍然是“热烈欢迎宣传队来校宣传毛泽东思想”。

2、很快，团总部发现这一回的工宣队与前几天的是大不一样的：一是人数非常多。惊讶之中的团派负责人（包括蒯大富在内）将3万左右的工宣队夸张为10多万；二是也不是吃素的。表面上看虽然是手无寸铁，但“手无寸铁”也并不等于没有“暴力手段”。他们从进校第一时间起就受到任传仲长矛队的严阵以待，受到刘才堂的鸣枪示威，受到小老团们的辩论指责，到处是“闭门羹”的接待，所以他们不可能产生像东区工宣队那样的好心情和好态度，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肢体暴力”，不仅重重包围了团派武斗据点，也拉走了从据点中走出来“讲理”的团派小头头与一般群众。说起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成立。只要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双方就没有调和余地，必然越演越烈，最后是你死我活。

于是广播台的宣传基调就改变了，“热烈欢迎”改为“紧急通知”。

3、中午12点多，蒯等回到清华西门。蒯在《岁月流沙》中说：“开始，清华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呢就不一样了。”

2015年1月14日，我们在宝安看望蒯大富时，蒯主动告诉我们：当他进入学校时“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才不一样的。”

蒯的说法有点蹊跷，显然表明调子不是他定的，但又没有说是谁定的？那么，他想暗示什么呢？

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正是在这个时间点，刘才堂从静斋溜到了明斋，蒯莫不是在暗示是刘才堂定的调？有这个可能性，但不能下结论。

4、蒯书第343页蒯大富回忆说：“工人得到了指示，凡是出来和他们辩论的，当场就被拉走了，我们思想上特别敏感，自我感觉特别美好，认为这个工人指挥部里面有人要激化矛盾。”

这又是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莫名其妙”的话的背后一般都有矛盾、复杂的心理。

对于“学生都拉走了”的现象，蒯大富的心中“特别敏感”也就罢了，为什么还会“特别美好”呢？老蒯究竟在“得瑟”什么呀？

我们再三琢磨这段话，原来蒯大富心中有一个“三段论”：大前提：黑手的方法总是激化矛盾；小前提：工宣队抓学生就是激化矛盾；结论：工宣队是黑手操纵的。

那么黑手是谁呢？蒯大富一口咬定是“杨余傅的黑后台”，后来在“7 2 8 召见”时，蒯大富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面前。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

谁知道毛泽东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韩爱晶在一旁说：“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仍然说：“不可能！”

蒯大富的推理很合理，毛泽东给出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对于毛给出的这个结果，蒯没有胆量接受了。

事实上他当时就不相信毛主席的话，事后仍然不相信，直至7月30日，他还继续同意抓“黑手”。

蒯大富的推理究竟错在哪里呢？原来是“大前提”出了错。因为“激化矛盾”的不仅仅是“黑手”，“红手”也常干这样的事。所以谢富治在“7 2 8 召见”时插话说：“是一只大红手”；后来迟群讲：“我们后面不是黑手，是一只大红手，你揪吧！”

于是，我们理解了蒯大富的“特别美好”是指他“特别敏感”到新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终于到来了，他要在这个新一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再立新功。

那么这个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指谁呢？就是指“杨余傅的黑后台”；而“杨余傅的黑后台”又指谁呢？蒯大富的心中是早有结论的，那就是周恩来。

文革中的清华两派有一种相当普遍、私下里也很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争”。“新文革”的代表人物是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旧政府”的代表人物是周恩来。周恩来身后有旧政府中12个副总理除谢富治之外的11个副总理，还有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绝大多数的开国元勋。而且周还有新的同盟军，在1968年的夏天，周的新同盟军中有林彪、康生与半个陈伯达。毛虽然站在江青身后，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他必需装扮成不偏不倚，处于仲裁位置。

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就咬谁。江青帐下的张春桥与姚文元、王关戚只是江青找来的狗，由此形成一个“四人帮”。“四人帮”其实就是一个咬人的“狗帮”。蒯这类极少数极端极左造反派自称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其实他们的地位又要比“江张姚”低一档次，只能算是“狗的狗”。他们坚定地站在江青领衔的“新文革”一边，潜意识中盼望着向“旧政府”开炮的时机。

刘少奇被打倒后，蒯大富活学活用“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教导，认为旧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束后，新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又产生了。就在10天前，7月18日的“清华—北航黑会”上，蒯大富还在向全国造反派兜售他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的内心深处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5、下午1—2点钟，午睡中韩爱晶被北航常驻红代会的代表陈良唤醒，与陈一起从北大去了清华。他们看到在清华大学西门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都

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韩爱晶听到“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正声嘶力竭地喊着：‘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韩爱晶说：“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韩听到的正是7 2 7那天团派的经典广播。从中午1 2点多到晚上1 0点多，团派广播就是这个调子，这是团派“7 2 7”全部行为的注脚。

但是韩爱晶没有指出，定这个调子一定是经蒯同意的，更没有指出这个调子的出台表明了蒯大富已经公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韩与蒯有大同也有小异。在“打倒刘少奇”战役中，韩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劳，所以他不会产生蒯那样“特别敏感”与“特别美好”的感觉。

三、7 2 7第一谜：为什么没有人通知蒯大富？

清华文革中存在着许多历史之“谜”，仅“7 2 7事件”就存在不少“谜”。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有“三大谜”：

第1谜：工宣队进校，为什么没有人通知蒯大富？

第2谜：7 2 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第3谜：“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谁？

关注第1谜的人有很多，所以有普遍性。

首先是蒯本人。几十年来他始终耿耿于怀，喋喋不休，似乎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弗洛伊德情结”的中国版：“祥林嫂情结”。

其次包括当时的清华两派的大大小小的头头与上万名普通学生与教职员，还包括外校人韩爱晶，4 1 4曾经的二把手孙怒涛，以及几乎所有研究“清华文革”的人，如现职的清华教授唐少杰、秦晖等。

韩、孙、唐、秦四大“高手”都在各自著作中对此作了分析、推测或猜测。他们的分析虽然都有或多或少的意义，但从一开始就缺少准确的判断，最终都因缺少有力的证据而不可能为各方信服。他们都没有预测到唯一的原因只能来自于毛泽东本人的“保密”指示。

有的认为这件事一定是周恩来做的，只有周才有这样大的能量与能力；有的断定是迟群与谢静宜，认为只有这两个小爬虫才有取代蒯大富成为文革新标兵的野心。

老实说，这个谜对于本书两作者从来就不存在。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能做这件事的只能是毛本人。

我们虽然坚信，但也没有证据，为此与一些校友在校友网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辩论。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了谢静宜的新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这个谜底才算揭开了。

谢书中有一句极为关键的话：“毛泽东又补充说：‘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我们将此称作为伟大领袖的“保密指示”。

正因为有了这个“保密指示”，所以当时活跃在政坛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才没有一个人去通知蒯大富，大到党内大佬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小到“小八答拉子”的迟群、谢静宜；亲到老婆江青；还有不大不小、不疏不亲、不尴不尬的谢富治。

他们中大多数人之所以不“通风报信”是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蒯大富！他算老几？他的生死存亡与我们何干？

大多数人同时也“不敢”。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谁敢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谁敢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呢？

有的人“不敢”还要加上无奈，如江青，以及谢富治。从主观上讲，江、谢对蒯还是有点小感情的，也有利害关系，他们想通知，但不敢。

有的人的“不敢”，刚好自己也“不愿意”。如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也包括吴德在内的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领导。他们对蒯的态度在中央高层7月25日凌晨接见广西代表团时的讲话中表达得非常明显。他们看透了蒯的本质，看穿了蒯的野心，“清华—北航黑会”使得他们更反感。毛的“保密”指示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乐观蒯大富去猖狂，去发颠、去出丑、去暴露、去自取其辱，去走向灭亡。

有的人则可以乘机表现自己，崭露头角，如迟群、谢静宜等，他们本来就与蒯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交情，却有重大的利益冲突。

至于林彪，他从一开始对蒯大富就没有好感，“4 1 4 战歌事件”更加深他的反感、轻视加蔑视，他不屑于去趟这趟混水。

但是，历史证明这件事最终是通知了的，是谢富治交待吴德通知的。谢富治为什么敢“违抗”毛泽东的“保密”指示？无非是三种可能：毛泽东改变了保密态度，私下对谢的指示；江青私下要谢向蒯打招呼；谢自己打的“擦边球”。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仍然是毛泽东对谢富治亲自下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吴德在7 2 8召见时所作的插话就是有力的证明。

四、7 2 7 第二谜：7 2 7 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里了？

4 8 年来，人们并没有发现这里存在一个“谜”。

这个“谜”是本文两作者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通过时间排序、逻辑推理，开始怀疑这里可能存在着“猫腻”。继而，有两位热心的清华校友周忠荣与樊程先后提供了那个年代的火车时刻表，经进一步时间排序，竟然发现7 2 7 上午蒯大富有两个多小时的“神秘失踪”。最终，又通过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与《清华蒯大富》两书的反复比照，所以我们确认：吴德在上午9点多钟在北航找到了蒯大富，10点钟左右吴德在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清华的决定通知了蒯大富，要他服从与配合。

这个“谜”是具有一定爆炸性的。

蒯大富曾有一句颇为著名的话“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起就没有指望他能接受。

蒯的第一反应是揶揄：恭喜胡鹏池作出一个惊天发现，他说：48年前，蒯大富撒了个弥天大谎，不仅欺骗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而且欺骗了一万多清华精英。

我们郑重声明，这并不是个人发现，而本书两作者的共同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蒯接着说：“胡鹏池做出以上发现的主要根据是吴德的口述回忆。”

这也说对了。尽管我们发现蒯在727上午有两个多小时的“神秘失踪”，但如果没有吴德的这段回忆，我们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应该坦率承认，吴德的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明确注明时间。也许是他疏忽了，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吴德这段回忆中的每一句话都表明：这件事发生在727上午。

正因为吴德回忆中的缺陷，给蒯大富提供了一点点否认的空间。

但如果没有这个“缺陷”呢？蒯大富也会寻找其它理由与借口否认的。因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不仅仅是面对历史的问题，还有面对如何面对活着的战友们的的问题，蒯当然不甘心给历史留下一个“谎话专家”的负面道德形象。

（一）蒯大富陆续发表《答胡鹏池》

胡鹏池于2016年6月下旬在微信上陆续发布了胡、但合写的《727上午，蒯大富究竟去哪儿了？》后，蒯于6月27日、7月17日、7月27日分三次发微信《答胡鹏池》。后来，蒯将前两篇微信整理成文，以《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的行止去留——关于胡、但编造的“蒯大富7·27上午见了吴德”的海外奇谈》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8月15日《记忆》第164期。

该文约1800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文不对题，甚至是废话，与想要说明的问题有关系的内容仅只300多字：

“那天一早我和鲍长康去北京站接陈继芳，但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路上找了一家饭馆吃了早餐，然后就一起回清华了。……我回到清华时至多10：30。已看到大批工人进清华。我从西南门进来，后到静斋。马上开了紧急会议，决议两条：（1）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2）守住各楼，不让工人进楼。以上过程鲍长康一直在场。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

“下午1：30左右，任传仲带领一伙人冲破了工人包围。我想到市革委去问问情况，就拉着段永基出静斋……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

我们原来担心的是：

1、火车有没有晚点？（要知道文革时期的火车晚点是常有的事）有没有没接到这一列再等下一列？

可是蒯大富明确的说“没接到，在车站等了一会儿就走了”，根本没有这一列火车晚点和再等下一列的回忆。不仅蒯没有，鲍也没有，可见这列火车基本上没有晚点，而他们也没有在火车站耽搁。

2、有没有其它琐碎事：如汽车有没有抛锚？路上有没有塞车？有没有乘机在城里理个发或洗个澡？有没有什么人跑肚拉稀上医院？既然都没有这方面的回忆，说明这些都没有发生。

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蒯的答复时，我们立刻感到我们的推理站住了。

（二）胡鹏池、但燊质询蒯大富：四大点

蒯大富《答胡鹏池》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制造了一个“回到清华至多10：30”、“肯定10：30前回静斋”的新口实，我们断定这是一则拙劣的“新谎言”。

刑侦常识告诉我们，案件要素有三点：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有没有作案动机。

如果（只是如果）将此比作是一件案件的话，吴德无疑是原告，蒯大富则是被告。我们设想一下原告的主诉与被告的申辩可能是这样的：

原告吴德主诉：市革委在作出了“派工宣队于7月27日进驻清华，制止武斗”的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当面承诺“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说一定执行”。蒯大富回去后却出尔反尔，违背承诺，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作出了“抵抗还击”的决定，使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五个前来制止武斗，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员，同时打伤了731人，重伤149人。被告应对“清华727事件”中“5死、731伤”的大血案承担相应的直接责任。

被告蒯大富申辩：我于“10：30前回静斋”，没有与原告吴德见面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原告所声称的见面现场。所以原告方所声称的事前通知及我的承诺是不能成立的。

吴德早已经死了，但这件历史疑案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

表面上看我们是站在吴德的立场上重提旧案，实际上我们的身份始终是、仍然是当年的清华学生，如今的清华文革的研究者。研究者重提旧案的目的是搞清楚历史真相，谁有道理听谁的。

蒯大富究竟是“中午12点多”还是“10：30前回静斋”的确是关键，涉及“嫌犯有没有作案时间”、“在不在案发现场”的重大问题。如果吴德的说法成立，那么蒯大富有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空档；如果蒯大富的说法成立，那么“作案时间与地点”都不成立，本案就应该立刻撤消。

蒯大富要想证明后者，不能仅凭48年后提供的一面之词，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第一个问题：《清华蒯大富》第342页已经明确记载“中午12点多，蒯大富、鲍长康、段永基等人回到清华。”

1.蒯大富可能辩护说：书是韩爱晶写的，我不负责。

我们举出言证与物证说：蒯大富早就多次说过“史实部分，我和韩爱晶共同负责。”

2.蒯大富可能辩护说：即使是共同负责，也是疏忽。

我们答辩说：疏忽是可能的，但你们在选择这个时间点时不仅根据回忆，而且对回忆的合理性是经过思考的。

何以见得？

在米鹤都、张琦采写的《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中，蒯大富曾说“回到清华大学快11点了”，可是在成书晚得多的《清华蒯大富》中却将其更改为“中午12点多”。既然存在着“更改”，这就说明了有一个重新回忆、思考、选择的过程，“疏忽”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

第二个问题：清华校史292页明确记载“蒯大富中午12时后回校在静斋……”。

校史成书时间远在《清华蒯大富》之前，它是根据各方面资料综合研究的成果，而且又与蒯大富自己书中陈述的时间完全一致。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根据蒯大富现在的证词改变校史的结论。作为证据，校史记载比蒯大富现在的证言权重大得多。

对此，蒯大富只能哑言。

第三个问题：刘丰“电话门”。

《清华蒯大富》342页说：“十一点半钟，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三支两军办公室负责人刘丰打电话到团派总部找蒯大富。正巧蒯大富到火车站接陈继芳了，刘丰要总部其它人转告蒯大富……”刘丰打电话的时间与蒯大富回校的时间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蒯现在再三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呢？

蒯大富在《答胡鹏池》中辩护说：“刘丰也正在找蒯大富，可惜没找着。刘丰老将军90多岁了，还话着，精神很好。去年我到北京时他还请我吃东来顺涮羊肉。当时刘丰与吴德在市革委会的同一层楼办公。如果吴德正同蒯谈话，刘丰能不知道，还用到处找？”

我们反驳说：请不要将话题扯远了。2015年刘丰请你吃涮羊肉与1968年刘丰打电话有什么关系吗？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你的辩护毫无意义，纯粹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我们还要告诉蒯：“刘丰11点半打电话”这件事不仅在你自己著作中有，校史中有，而且40多年来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你现在编出“10：30前回静斋”的瞎话，却解释不了你为什么没有接到刘丰的电话。

仅凭这一点，你的“新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个问题：在“728召见谈话”中有一段对话：

毛主席：“……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这是召见现场毛泽东与吴德的对话，那时你已经到了现场，请问你听见了吗？如果你认为吴德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谎，为何当时不站出来和吴德对证。

蒯大富也许会说：那么大的一个场面，谁敢哪？

我们说：当康生说错话时，韩都敢当场起来顶，你怎么就不敢顶；你比韩爱晶的胆子谁更大一些？

（三）胡鹏池、但燊质询蒯大富：四小点

说完四大点，再说四小点。

几乎在所有的细节方面，蒯大富全都不能自圆其说：

1、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可是与你同时回校的鲍长康却说 he 回来时静斋在开饭。按照常识，“12点多”包括在开饭时间内，而“10：30”距开饭时间至少还差半个小时。

2、你说“我肯定10：30前回静斋，当时工人还未包围静斋，所以我得以顺利进楼。”可是你的书中说：“回到学校附近，看见工人队伍正浩浩荡荡往校园里开……鲍长康回忆是爬墙回的学校，蒯大富回忆说当时是在工人队伍旁边走进清华的。”所以所谓的“顺利回校”也是不成立的。

3、你说“当时开会有鲍，陈育延，任传仲等。”可是鲍长康回忆说他没有参加会，而且还说有陈育延的日记为证。

4、你说：“如果我在上午就和吴德见过面，已了解情况，怎么会有我再冒险出去找市革委这件事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清华蒯大富》343页，你本人已经将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正如你说的，你上楼并不是为了找吴德，而是为了找谢富治。只是因为没有找到谢，遇到了吴德的秘书才顺便找了吴德。

而且书中的对话部分纯属你单方面的记录，所以你没有记载吴德对你“出尔反尔”行为的批评与指责。

五、727第三谜：“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谁？

在728召见现场“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在《岁月流沙》中蒯的陈述更夸张、更肯定。他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

由此可见，蒯大富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仍然咬定工宣队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

我们强调：毛泽东于7月24日起开始部署的“清华727行动”是造成“清华727血案”的前提条件；

我们强调：蒯大富们对工宣队采取“抵抗还击”四个字的总方针是造成“清华727血案”的直接原因。

我们强调：蒯大富判断“工宣队进校”是“杨余傅的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继而将主观上的“判断”上升为性质上的“界定”，再将性质上的“界定”上升为行动上“抵抗还击”的决定；

我们强调：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并不是无稽之谈，既有“特别敏感”的政治基础，又有“特别美好”的期望值，心中实有所指，指的就是周恩来。

48年前，这在清华园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团四两派的圈中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从1966年8月初周恩来亲自到清华开大会为蒯大富平反，到1967年5月底周恩来用一张香烟盒一般大小的“纸条子”使得蒯大富成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梦想破灭到永远，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蒯大富对周恩来的感情与态度有一个从感激→有限感激→不满→怨恨→反对的复杂演变过程。其原因固然与蒯大富自身的文革经历，以及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江青的影响。

在整个文革期间，真正有“篡党夺权”野心的无疑首推江青，而江青始终将周恩来视作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江青的“反周”之心路人皆知；蒯大富作为江青与中央文革的“鹰犬”（蒯自称是“马前卒”），始终死心塌地站在江青一边。可以说蒯大富就是江青的“包衣奴才”这样的角色，蒯大富的“反周”之心和他的主子江青同样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蒯大富所说的“杨余傅黑后台”是指谁，但这不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故意没有正面回答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问题，而转化为“黑手就是我”。

（一）沈如槐的“三大奇迹”与蒯大富的“三大恶梦”

如果要更进一步说清楚蒯大富们的“杨余傅的黑后台”是指的周恩来，需要回顾清华两派斗争的全过程，以及中央高层对清华两派的联系和影响；需要说清楚蒯大富对周恩来的认识与感情变化的复杂过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个简单方法有助于读者对此有个初步的、简单的了解。

沈如槐书中最后部分有一段话：“530革委会被迫流产，1227陈楚三胜利返校、727工宣队开进清华，这三件事可以称为清华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大奇迹。每当414面对绝境的时候，清华就会出现奇迹，414总会绝处逢生。谁能说得清这是机缘巧合，还是历史必然？”这是沈作为414一把手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会所作出的概括与总结。

这三件大事在沈如槐看来固然是“三大奇迹”，可是在蒯大富看来呢？当然只能是“三大恶梦”。蒯同样也会想到：每当414濒临绝境，总会有一只无形的手伸出来挽救414。每每好事将成，总是横生枝节，“快要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已有一，一而再，再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727那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了。冲动是魔鬼，他这一冲动，他就完蛋了。

无论是蒯还是沈，他们全都明知这样的事实：从1966年7月29日到1968年7月27日的整整两年时间里，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亲自过问清华文革，即使后期不来了，也始终关注着清华。“三大奇迹”也好，“三大恶梦”也好，都与周恩来有“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二）杨继绳、韩爱晶、蒯大富、沈如槐的评论

著名作家，校友杨继绳在《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中说：“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

蒯大富在530成立革委会破产后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414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

40多年后，蒯大富在书中的话是说得比较平淡的，其实表现了当年他对周恩来深深的怨恨与愤懑！尤其是“周恩来就从来不对414说一句批评的话”这句话。

蒯大富的亲密战友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说：“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情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韩爱晶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外校人对清华文革的客观评论，也体现了蒯大富的心声。尤其是“伴随着……直至”，也算是“看透了”。

沈如槐断言：“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周总理在工宣队进清华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蒯大富要抓的‘黑手’肯定是指周总理，因为在当时代替中央书记处行使中央大权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里只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杨、余、傅‘黑后台’的人，那就是周总理。而蒯大富一直都将周总理视为414的黑后台、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

【一家之言】

## 从对联、老兵、联动说起

• 马小冈 •

在古今中外的对联史中，传播最广，搅动天下不得安宁者，恐怕非文革那副对联莫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坊间关于那幅对联的“出炉”大致有两种版本。一说是出自北大附中，另一说是出自北航附中。本人作为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一员，谨把对联“出炉”的大致情况略做介绍，以便留作历史旁证。

这幅对联的“原创”者并非北航附中，但是将其“包装上市”推波助澜者，则是北航附中无疑。

该对联的“原创”出自北京外国语学校，原作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当时文革初起，各种对联、大字报满天飞，后来校际间串联时，有人把这幅对联传抄到我校。在一次辩论会上，我校的岳×东说：“横批‘代代相传’不好，太绝对了，打击一大片，应该讲究策略……”（要知道那个时代凡事讲究“一分为二”，不像今天动不动就“绝对是……”云云），于是丁×生说：“就叫‘基本如此’吧！”此说得到一些人赞同，于是由江×东抄成“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大字报贴在校园里，此即该对联的改装“亮相”（后来对联的上联衍生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想与民间俗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贴近）。当时这幅改装后的对联在校园里并没引起太多注意，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淹没了。

不久，北航附中红卫兵又把这幅对联抄到北京航空学院校区（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由于北航涉及国防专业，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五类”家庭，因此这幅对联在北航引发辩论的响动不大。但是后来随着对联的不断传抄蔓延，在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影响，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北京化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化工大学）。那时化工学院大一学生任×刚曾是我们北航附中的毕业生，1966年7月29日上午，该校各派在主楼广场进行大辩论，北航附中红卫兵为了声援任×刚，便结伙到该校站脚助威，并且在辩论现场打出了这幅对联。因为现场人数上千声势浩大，这幅对联立即成为激辩的中心话题，对联的影响迅速扩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对联的“横批”——“基本如此”具有较大的弹性，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迅速流传，因此北航附中红卫兵难脱干系。坦诚地说，对联刚“出炉”时，包括本人在内的我校许多同学的心里是不赞成的，但是被潮流夹裹，身不由己。痛定思痛，对联的推出属于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之举，其后许多人主动反思与道歉，与此有直接关系。

这幅对联的要害是对非工农兵等“红五类”家庭出身者的人格歧视，是以血缘关系决定人生的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带有明显的封建传承色彩，这种不公平的社会政策遭到激烈质疑尽在情理中。

但是，不能因为曾经存在过不公正的历史政策而反过来采用“汉莫拉比”方式进行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有人把过去17年的精神压迫转变为后来持续40余年的血缘报复，将舆论攻击矛头长期指向昔日的工农兵等“红五类”，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发泄不满，终日沉沦在内斗穀中不能自拔，这种怨妇宣泄是不是一种悲哀？更有甚者，如今某些寻

仇者利用微信等网络私媒体公然散播社会仇恨，肆无忌惮地鼓噪掘共产党的祖坟。试问：天尚未变，其人已经磨刀霍霍，倘若真是变了天，是否要重演“石要过刀，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大围剿呢？那些逢中必反的人自甘做汉奸还乡团或民进党的预备党员，他们在向人们提示什么呢？其赤裸裸的变天言论难道是想证明那幅对联合理吗？以阶级斗争为纲要不得，但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却被某些人逼迫着你不承认都不行了！微信私媒体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颜色革命的舆论铺垫，这种斗争存在的客观现实已经毫不掩饰地摆在执政党的面前。

文革期间与对联同期出现的就是红卫兵运动。所谓北京“老兵”即老红卫兵的简称，特指“最高统帅”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老兵”在文革派系林立的群众组织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其行为激进张扬，似乎颇为另类（在当今许多影视作品中，“老兵”是诸多红卫兵派系中的一种代表性脸谱）。之所以如此，皆源于一顶沉重的“桂冠”——北京“联动”，即“首都中学生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也。1967年1月17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同年1月31日《红旗》杂志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言联动是“反革命组织”。于是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大学红卫兵组织以及“首都三司”等人马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查抄捣毁了北京八一学校等所谓“联动据点”，先后在京抓捕139人，并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此时距“联动”“12.26”集会仅仅一个月左右。

毫无疑问，当年北京的“联动”是由“老兵”组成的，说“老兵”=“联动”也不算太冤。但耐人寻味的是，由北京中学生发起的“老兵”及其“联动”，与由大学生组成的“北航红旗”、“首都三司”相比，无论是物资实力、组织结构还是受中央文革的重视、利用程度，前者都远不及后者，但为什么“老兵”和“联动”的恶名指数却远高于“北航红旗”、“首都三司”？此疑问一直困扰了人们四十余年。

仗势造假欺骗舆论，文革时代首开先河。据我所知，当年在北京八一学校举办的那个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展出的东西基本是伪造的。我不得不佩服组织办展方的想象力。那些五花八门的什么“联动纲领和罪行”犹如旧中国的封建会道门与希特勒褐衫党的杂交物……如果“联动”真有那么严谨的组织和能量，文革历史就会改写。该展览的始作俑者之所以如此“抬举”当时的中学生，除了文革特有的“派性”作祟以外，实乃“北航红旗”、“首都三司”秉承文革当家人的政治需要。

事情的原委是，文革爆发仅仅6个月后，当年那些处于青春躁动的少年小子因为社会和家庭的突然灾难而被迫做出反弹，于是由北京“老兵”发起的“联动”于1966年12月26日在北展剧场的首次大规模集会就以“被逼上梁山”的悲情向文革司令部发难，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其造反精神带有父辈那种“砍头不要紧”的味道，这是文革司令部绝对不愿意看见的。张春桥警觉了，他最先称这些中学生为“十二月党人”，这无疑是以俄国反叛的贵族提示当权者：最危险的敌人来自营垒内部。其后他们对“联动”的打压并妖魔化也就尽在情理和法理之中，这应该是设立“联动罪案”最本质的原因。

本人无意为“老兵”和“联动”抹粉，但求还原一段历史真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为一个群体，北京的“老兵”和“联动”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发难第一人。网络上对“联动”的描述往往带有明显的文革式批判和演绎色彩，有道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作为亲历者，我们这些人无人能写“联动”历史，不是不敢写，而是“联动”根本就没有成型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缘于一次集会，全无真正的组织可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仅仅存在了两个月的北京中学生的“乌合之众”，当年却是中央文革的心头大患，于是最高层的恼怒与最底层的积怨通过文革的历史契机结合在了一起。四十余年来，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污名早已扔进垃圾堆时，“联动”的恶名却永世不得翻身地沉淀



在某些人的思维中，将“联动”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这种源自毛泽东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暴力言行被一些心怀仇恨的人长期操控，尽管他们反对“血统论”，可他们仍然以血统思维批判社会。在他们眼中，但凡工农兵红色后代，统统要下地狱！如此用双重标准评判今昔，悲乎哀哉！

以偏见和造假诱导后人是不道德的。如果其人文革时期并未置身世外，却在今天一味地指摘他人，似乎文革的一切恶行都是别人干的，与己无关，这种人的道德品质令人不齿。任何历史都要求实，“老兵”和“联动”的历史至少应有亲历者佐证。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四中的孔丹、八中的陈小鲁以及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人以自省的理性态度写过有关文革的历史，他们的声音显然与众不同，但我认为有据可信。希望更多不同的亲历者拿起笔来，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下一些有据可考的信息。

文革没有“先知”，文革没有赢家。无论是工农子女，干部子女，还是其他人的子女，都是受害者，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干过荒唐的事情。不要忘记，经过17年的政治熏陶并在文革那样一种激烈与疯狂的社会氛围中，没有独醒的圣人。那一代人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民熏陶下成长的，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别说是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就是他们的师长也是那种思想教育的信奉者和推行者。“血统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把帽子单纯扣在所谓“红五类”头上是不公正的。我们不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教下以“血统”的理念伤害过无辜的师长和同窗，同时也应看到无数干部子女被人以“联动份子”——这种同样带着“血统”色彩的恶名贴上了标签，殊不知对别人作妖魔化涂抹的人，自己的心灵并不高尚。

综观人类历史，从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到司马迁的《史记》，充满统治者的权斗和平民间的仇杀，冤冤相报，永无休止。“联动份子”作为一种恶名至今都在被某些人用来攻击政敌。北大一位钱姓教授居然放言：“要警惕老红卫兵当政”。其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本人以为，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是这种“后血统论”，它在逼人重新审视“血统”、“阶级”的现实性。且不言“老红卫兵”一代如今已经走入领取退休金的队伍，即便是有当政者，是否需要贴上“老红卫兵”的标签？反过来看，如果今天当政者有往昔被称为“黑五类”者，难道也要贴上标签提示人们去“警惕”吗？人们可以有分歧，但不妨碍平等相处；人们可以存争议，但不能煽动旧恨新仇。然而在这位钱姓教授的历史课本里，文革这一页永远停留在原位——“老红卫兵”应该取代“黑五类”并永世不得翻身。

今天再去翻捡历史垃圾，把人群按照“老红卫兵”、“××子弟”、“××二代”划分，显然是非理性的。台湾人民把陈水扁拉下“总统”大位也许并不因为他的草根出身，后来把马英九推上“总统”大位也并非因为他是贵族子弟。我们的心智为什么不能成熟地站在历史的高位冷静地回望和思考呢？

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以各种方式向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这不仅是勇气和心智的成熟问题，它说明这一代人的良心没有泯灭，说明这一代人能够对历史做真诚的忏悔。“老兵”已经有人道歉了，但是那些“四人帮”的打手和文革受益者们有谁道过歉？那些蹂躏了千千万万个女知青的基层干部有谁道过歉？那些至今专吃文革饭，靠攻击他人赚取名声的所谓专家学者有谁道过歉？知耻近乎勇。历史上不乏有下罪己诏的帝王，上自夏禹商汤，下自汉唐明清，有过二百六十余份帝王的罪己诏，唯独不见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文革罪己者。

文革没有官修史，逐渐成为一段众说纷纭的往事。且不说持续十年的内耗对国家的伤害，此十年对人性的摧残至今没有受到清算更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信任从

此随风散去……与过时的冷战思维一样，有太多的人仍在沿用文革式的思维和手法评判文革。若此，再有第二次自上而下的文革式运动，今天的学生、职员、农民工等等，照样会做我们当年干过的蠢事。今天重谈“对联·老兵·联动”，除了辩诬以外，也是一种灵魂的反思和救赎，我们需要从沉沦中重新启蒙和提振一种已经久远的民族自省精神。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时代的“老兵”或者“四三派”都是在争取一种预期的权益，“三司”也在尝试着文革当家作主的风光，因此他们之间的纷争带着明显的利益诉求。今天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各异，理念追求不同，人们的期望值永远不可能归一，各种理念纷争实际上都表现着类似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等对立党派的思维与争斗，只不过我们今天的“人大代表”不足以体现不同族群的利益心声而已。因为没有代言渠道而矛盾却不可调和，网络成为不同诉求者唯一的发声平台。由此看来，对于寻仇者没完没了的网络攻伐言论，仅仅保持理性沉默是不够的，这正是笔者写下本文的初衷。

最后想澄清一下，坊间所谓“老兵”、“联动”全部由干部子女组成，错了。我校“老兵”里除了干部子女以外，有许多工人、知识分子子女；与我们对立的文革掌权派组织里也有干部、工人、知识分子的子女，其他学校也是如此。后人拿一种被误导的思维定势看待当年的公案，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老兵”和他的同龄人已经谢幕了，但每当这些人聚首时，文革永远是说不尽的话题。今天企图用娱乐八卦冲淡他们的政治情结，那是枉费心机，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沉淀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祖训。

2011-12-26 初稿，2017-4-10 修改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